

环境议题的符号化治理：理论与路径¹⁾

李红

摘要 环境问题不仅事关自然，同时也涉及观念和社会。符号能够表征自然，传播观念，解决冲突。符号表征能处理环境识别问题，符号修辞能处理环境争议问题，符号话语能处理环境权力问题。据此，环境议题的符号化治理即是通过正名以处理环境公共性问题，以使环境问题被纳入大众视野；通过修辞争论以处理议题协商和合法性问题；通过话语建构以使权力转化为知识，以获得自然化效果。

关键词 环境议题；元治理；元符号；符号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李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广州 610632

一、问题的提出：环境议题的符号化治理

环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学科领域，其基本任务是防治环境灾疫，重建环境生态，以实现“自然、生命、人”的合生存在和“环境、社会、人”的共生生存^[1]。环境治理不仅依赖于自然科学以解决生态问题，而且还需通过符号行为及其实践理解人类的行为，因为“如果人们对于符号机制对自然在不同文化中的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缺乏理解的话，就不大可能解决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无法在自然中为文化找到稳定的位置”^[2]。于此，环境治理问题就聚焦到符号实践上。

（一）环境元治理：自反性视角

环境治理可以被定义为“治理机构或其组合为缓解公认的环境困境所做的努力”^[3]；也指政治行为者影响环境行动和结果的一系列监管过程、机制和组织，其关键是制度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塑造身份、行动和结果^[4]。传统环境治理的焦点在于对环境问题产生的物质源头的治理，而现代环境治理的焦点则在于对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治理^[5]。尽管人们对适合不同治理对象的制度设计问题很感兴趣，但治理理论家却很少关注治理主体及其价值观的改革^[6]。而通常的治理研究往往侧重于有关具体问题的集体决策或目标实现问题，而很少追问这些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和话语中被构建的^[7]。正是通过词语、视觉、姿态等符号化方式就环境问题进行讨论、争论或质疑，环境治理的“公众”（public）就形成了，也便形成了有关环境传播的公共领域^[8]。

福柯主义者（Foucaultist）感兴趣的是权力和知识在塑造社会行动者属性、能力和身份上的角色问题，以及在自反性治理的背景下如何使其能够自我管理和自我转变^[9]。有效治理必须培养起反思和重新平衡各种模式组合的能力，以应对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网络舆情治理的符号化路径、方法与策略研究”（2018XXW014）。



市场、国家和民间社会界面存在的挑战或机遇的变化^[10]。面对治理失败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元治理”（meta-governance）概念，以处理关于治理的治理问题。它不仅涉及制度设计，还涉及主体和文化的转型，涉及到对一系列复杂的自反性社会实践以及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的治理，以形成基于特定时空固件而成的话语和制度框架^[11]。根据研究者的梳理，元治理通常包括四种理想类型：网络元治理（network meta-governance）、多层次元治理（multilevel meta-governance）、多样化元治理（meta-governance of multiplicity）及模型元治理（meta-governance of modes）^[12]。作为一种自反性的组织或实践，元治理的特征在根本上有别于基于市场的交换性和基于权力的强制性，它体现为环境治理的底层性、协调性、文化性和批判性。

（二）元符号推演：环境元治理的动力

元治理的自反性和批判性如何获得？它必须依赖于元符号，借助元符号才能不断推进治理机制与治理逻辑的深度重构，以实现善治。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但是实验证明，动物也是可以使用符号的，甚至电脑也有符号能力。只有人类具有“符号升级”（symbolic ascent）的能力，它能够通过符号去推进符号，获得反思的能力，毋宁说“人是使用元符号的动物（animal metasymbolicum）”^[13]。洛特曼（Lotman, Y. M）认为“元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本，而是文本的模式，是模式的模式”^[14]，它是不断推进人类认知的过程。符号化治理实际上就是通过符号不断推进反思，以此在深层维度重建治理模式，并将治理模式建构在坚实的现实、模式以及文化之上。

学术界曾提出“象征治理”“话语治理”“治理的符号实践”等概念，但尚未将符号治理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路径提出来。索蒂里亚·格雷克根据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概念而提出了“象征治理”（symbolic governance）的概念^[15]，认为度量标准（metrics）作为一种象征治理的全球测量工具，不仅指导政策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而且还指导生产者 and 接受者，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因为象征资本能够赋予拥有它的行动者以“创造世界”

的权力^[16]。“话语治理”（discursive governance）在本质上指的则是以政治语言中的叙事、主题和策略隐喻为基础的隐性治理机制，以及随后使用这些语言来插入思想的政策框架，以根据政治当局的意愿影响公共领域内的政治和社会表征^[17]。米歇尔·拉扎尔则从“治理的符号实践”（semiotic practices of governance）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新加坡国家礼貌运动中的符号实践如何促进了国家的治理，发现礼貌性的符号风格转变使声音软化，使人际关系不再生硬，以及文本投射的社会关系和身份促进了彼此的和谐^[18]。上述治理路径实际上是以个案的方式在文化象征、话语实践和符号实践等三个维度展开的，而尚未建立起符号化治理的理论框架。

（三）环境治理：符号化方法

环境治理常被置于话语角度进行讨论，即如何针对环境治理的问题进行言说，比如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话语在不同时代在沟通、动员、教育、凝聚共识等方面如何引领环境传播格局，并深刻影响环境治理的实践及其效果的；它侧重于提取政策的核心规范及其社会诠释的意义体系，并以此为枢纽探究行动者的观念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19]。环境话语也是以多模态环境符号进行的意义生产和再生产，对社会和环境事件进行建构与被建构的循环实践，它包括文本表征、意义争夺和社会建构三个层面。已有研究的主要焦点在于话语的策略改造和隐性规训效果，它也关注如何通过话语进行社会和意识形态分析，却怠于分析调停社会风险和解决环境问题^[20]。

环境议题的符号化治理依靠的是元符号对所指的不推进，它可对应于皮尔斯符号学体系的无限衍义（infinite semiosis），以最终接近“对象”（object）。在皮尔斯看来，符号过程（semiosis）包括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三元关系。符号治理即涉及符号表征（representation）、对象指称（reference）及主体解释问题，并以此带出话语修辞与意识形态问题。比如“绿色”作为一种颜色的指称，也具有象征性的环保意义，而当它被商业或者资本操纵以实现“漂绿”（greenwashing）之时，它就转化为

了一个修辞问题，并给指称的真实性带来了威胁，因而相关的伦理审视、修辞批评及政府规制就显示了对于“漂绿”话语的警惕^[21]。而且，中国官方和民间的绿色话语体系尚未接轨，如何将诸多利益相关者导入绿色公共领域将是破解环境困局的关键^[22]，对此必须仰赖于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的共识，形成某种象征符号形态。工业社会的结构性缺陷始终需要一种基于“自我对抗”的“自反性”（reflexivity）符号实践，即公开论争和民主审议，如此才能促成一种“自反性制度安排”^[23]，即通过符号实践推进元治理。因而，符号化治理（Semiotizing Governance）是基于符号实践（semiosis）而展开的治理模式，由此，表征、修辞以及意识形态等符号力量得以被应用到治理实践中来。

综上所述，环境元治理通过元符号或者解释不断加以推进，如此才能克服治理失败的问题，从而获得更加完善的治理模式。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环境问题的符号化治理体系如何建构？它展现于符号的哪些维度？其具体治理路径为何？

二、环境议题生成的符号化机制

环境何以成为问题或者议题？符号是环境问题的底层逻辑：“当我们通过无数的符号、文字、图像和表述来了解自然界时，我们的传播（作为一种象征行为）积极地塑造着我们的感知”^[24]。首先，符号将环境表述为问题或议题；其次，符号展现了环境中主体的不同立场；最后，符号蕴含了丰富的环境观念、价值或文化。因而，环境问题的符号化过程就展现为符号表征、符号修辞和元符号三个层面，并在知识或制度层面将其加以体系化。

（一）环境问题的表征：符号生产与认知重塑

环境问题或议题被符号所表征，其治理实践才能启动。符号表征可从三个层面去理解：（1）对人、事、物等对象进行道说的反映论；（2）展现表达者内心的想法的意向性；（3）通过符号系统建构文化的构成主义^[25]。这可与上述皮尔斯的理论相对照，并围绕符号三维而展开：反映论处理的是环境客体问题；意向性处理的是环境主体问题；

构成主义处理的是环境文化问题。

首先，就反映论而言，符号将环境表征为问题或议题。（1）环境借助符号以实现命名，以抓住环境问题的核心要素。比如温室气体（GHG Greenhouse Gas）实际上包括了水蒸气、臭氧以及数量众多的化学气体，但是其命名则强调了与地球变暖的联系，使其获得了一种可感知的维度。（2）符号抓住决定性瞬间以使环境问题得以可见。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造成的危害如何？直到石油从破损的井口冲入海水的录像被公布后，公众才真正受到震撼。（3）凝缩图像将环境问题置于象征性意象之上。凝缩符号（condensation symbol）能将“强烈的情绪、记忆或关于某事或状况的焦虑”加以符号化^[26]，比如将北极熊作为北极的凝缩意象以展开气候变暖的叙事。

其次，就意向性而言，符号通过焦点、角度、框架等彰显主体的动机（motive）。（1）焦点反映主体的目光所向或价值取向，比如排污企业常倾向于征用所谓环境“标准”以解脱，而环保组织则倾向于呈现飞鸟死亡的环境惨状以打动人心。（2）角度则体现主体的社会位置。比如仰视、俯视、平视等角度分别展现着主体欣赏、贬斥以及平等的态度。（3）符号框架体现主体的认知模式，它是无法有意识地访问而只能通过结果来推断的认知结构^[27]，比如对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议，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公开信（2016年）采取了科学框架，而绿色和平组织的回信则采取了规范框架^[28]。

再次，就构成主义而言，符号建构了环境的文化意义。在索绪尔看来，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连接依靠的是文化所积累的“社会事实”，其意义也依靠符号结构系统；在皮尔斯看来，符号的意指关系不仅涉及像似、指示、规约，而且涉及观念、信念、习惯或规则；詹姆斯·凯瑞也认为每种符号都有两种不同的特征：替代性（displacement）和生产性（productivity），即符号能够指称对象并建构现实。因此，符号化不是一种纯然客观的表征，而是充满着深厚的个体、社会或文化脉络，环境治理即通过符号而实现对思想或文化的治理，比如西方常将环境治理视为“危机



学科”，而中国则基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等人与自然的沟通方式而建构的“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话语^[29]。

（二）环境问题的争议：修辞动机与意义争夺

在环境问题中，主体间基于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但背后的意义冲突及其思维机制则隐而不彰，此即修辞动机，它是基于对某些不一致或者冲突的刺激的典型模式所作的粗略简述^[30]。就物理学而言，机械性关系是一种“因-果或刺激-反应”关系，而人类关系则是一种符号象征关系，人类关系须通过符号才能认知。只有通过修辞动机及其意义争夺的考察，才能把握环境符号化的争议点所在，为环境符号的施事性（performative）奠定修辞逻辑。

首先，环境符号要素配对建构主体的修辞动机。动机并不是纯粹心理的，而是符号性的，是体现在符号要素配对当中的。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在对行为情景（situation）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修辞动机分析的戏剧五要素理论，即通过施事者（Agent）、行动（act）、场景（scene）、方法（Agency）和目的（Purpose）等五要素进行配对分析，以把握修辞动机。因为在一个行为事件中，往往需要一个描述行为的词，还有描述场景的词，并表明哪种人是行为的执行者，使用什么方法或工具，以及目的是什么^[31]。五要素以不同的方式两两组合，便可形成十个基本关系对子，不同顺序的对子构成不同的因果关系，最终形成不同的动机阐释。假如将环境问题的符号化作为一个“事件”，它便包括上述五个要素，对其两两配对关系的分析，即可获致其中的动机脉络，而对其中不同动机间关系的考察，便能建构起相应的治理路径。

其次，符号争议点的转移体现了环境意义的争夺。环境问题的争议，并不止停留在一个争议点上，而是会经历不同争议点的转移，形成不同意义争夺的博弈关系。根据赫尔玛格拉斯（Hermagoras）的争议点理论（Stasis Theory），争议点是修辞构筑的起点，它是论点、论据得以展开的基础。争议点常按照顺序分别在“事实”“定义”“品质”和“程序”之间，为修辞争议确立说服的

方向。环境符号总是面临事实亦即真相如何的争议，比如污染是否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但是也可以提供不同的事实加以证伪或者证实；即使污染事实毫无争议，也可通过“定义”重新界定事件的性质，将其解释为经济或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使定义无法解决争议，也可通过“品质”论证其行为的正义性，将行为解释为“善良动机”；上述努力皆不奏效，也可在管理规范、符合标准等“程序”维度论证获得其合法性。事件的不同主体往往停留在争议点的不同位置，而何种争议点获得竞争优势，则与社会舆论、社会共识和法治规范密切相关，于此即可把握环境治理的舆论、价值及法律逻辑。

再次，环境科学始终充满修辞性。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作为最高理性曾经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获得了一种象征合法性（symbolic legitimacy）^[32]；而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就担心“技术民主化”（technocracy）的问题即仅靠专家治国。但在环境争议当中，直接利益相关者并不是基于信任而服从的，而是期待可靠的证据，科学往往难以提供结论性或者完整的证据。环境问题也充斥着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环境科学的“平均而言”解决不了个别的伤害问题，更解决不了影响的因果性以及累积性的问题^[33]。科学在试图解决环境风险的同时，往往会导致难以预测的风险，这是一个自反性的过程。环境治理的冲突不可避免，其权威并不确定，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主化的修辞过程。

（三）环境议题的权力：元符号与意识形态

环境议题常常被种族修辞所包装，形成某种环境种族歧视（environmental injustice）议题^[34]，并在其身份、种族、正义等问题上建构了丰富的内涵。另外，环境议题还包含殖民、性别、阶级、地域等权力关系，呈现为相应的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蕴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宏大的社会运动。

首先，意识形态是通过元符号而获得其含蓄意指的。按照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理论，符号可以分为两层：第一层是直接意指（denotation），第二层是含蓄意指（connotation）；含蓄意

指的自然化（或隐蔽性），依靠的是直接意指的现实性或者日常化。比如“黄河母亲”作为含蓄意指，就利用了“母亲”的天然血缘与情感纽带，它对于黄河的保护即获得了一种基于中国文化的伦理特质，有助于召唤起环境保护的深层情感。“母亲”作为一种具有血缘、生活、情感等丰富内涵的能指，是“黄河”的涵指项（connotateurs），它“最终永远是不连续的、‘不规则’的记号，这些记号被传递它们的直指的信息自然化了”^[5]。在此，“母亲”与“黄河”就形成一种隐喻关系。而涵指的所指则是意识形态，它同文化、知识、历史等密切相通，使外在世界得以渗入符号系统当中。当“黄河”符号的内涵（所指）被“母亲”符号（能指和所指）所阐释，“母亲”成了“黄河”的元语言，在身份、体验、伦理、文化等维度诉说着黄河的环境意义。

其次，符号必须在环境实践的“市场”中获得某种“价格”。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使语言脱离了与实践的联系，将语言置于一种纯粹结构和形式分析的维度，剥夺了它的实践功用和政治功用^[6]。实际上，语言交流总是充满着权威的言说者和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的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并且充满着现实的制度、文化、资本等综合性现实。可以说，语言的权威来自于外部，它的“价格”来自于“语言交换市场”（场域）。每一次言语交流都会涉及相关资本的不均衡分配，不同群体进入语言合法渠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就形成了一种充满实践感的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比如中国 NGO 的绿色话语“缺乏西方辩论的传统和活跃的政治讨论；其重心是从文化层面督促公众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与传统的关系，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伦理道德”^[7]，因而中国式的环境治理便是以呼唤而非抗争的方式展开的。

再次，知识通过话语使权力得以分配。知识与权力并不是对立的，两者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8]当知识通过符号进入到社会实践当中，它就通过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等方式对

实践进行规范，成为一种可以干预现实的话语。通过监视、检查、裁决、惩罚等方式，知识还被权力所言说和运用，对现实产生物质性影响。比如当“绿色”符号成为主流环境话语，它便获得了知识权力，成为衡量国家承担国际义务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标尺。但是统一的标尺掩盖了不平等的事实：它形成了一套衡量国家发展的新知识和指标体系，反过来对发展中国家构成道义上的约束力。比如二战后美国率先提出了“债务换取自然”（Debt for Nature Swap, DNS）构想，试图通过减免第三世界的部分债务以换取他们对热带森林的保护，于此，美国便成功地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与自身捆绑在一起，以从中获取诸多好处^[9]。

三、环境议题的符号化治理路径

如上所述，环境表征是一个认知问题；环境修辞是一个主体间问题；环境话语是一个权力问题。在环境表征中，符号实践的目的是将环境问题加以更好地呈现，以让环境问题获得科学、规范、公正的处理，此即符号规范的“正名”问题。在环境修辞中，主体往往处于不同的动机位置，并在利益、价值、观念等层面展现出相应的矛盾或冲突，符号治理的目标即是通过修辞实现对争议的处置。在环境话语中，环境问题往往展现为对于知识的征用，并通过知识携带出某种特定的权力关系，它处理的是意识形态问题。据此，环境符号化治理的对象就可分别概述为：对符号的治理、对争议的治理和对意识的治理。

（一）符号正名路径：环境命名的公共性

中国古人对于符号治理的问题格外敏感，孔子曾经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正名”理论，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其核心即通过修身而实现“正名”。荀子在其《正名》篇中则强调王者的制名，即在国家层面实现符号的规范化；名家和墨家对于“名”的谈论则具有很强的思辨性，以通过知识论或逻辑学的路径解决“正名”的问题；法家以及黄老道家形成了以刑名法术为支撑



的“循名责实”的规范论，“正名”成为一个制度问题。于此，“正名”问题的解决路径就包括了修养路径、逻辑路径和制度路径。

首先，环境治理需要在认知层面解决符号感知的公共性问题。符号总带着某种主体的修辞动机，其表征面临私人性问题。据维特根斯坦的说法，私人语言是只有说话人知道而其他人不能理解的语言^[40]，它是对语言“游戏规则”的偏离。符号不仅只有语言，而且还有图像、行为、仪式等象征形态，它们是否仍然还有坚实的“游戏规则”呢？图像更多是在感知层面展开，具有很多无法共享的部分，因而常“被卷入多元和冲突性的话语激流当中”，构成了“一个政治得以发生的语境”^[41]。在此，符号意义的呈现并不是一个绝对私人还是绝对公共的问题，而是总在两个端点之间滑动。就环境问题而言，当事人往往具有切肤之疼，但是这种感知能否被官方或者大众所共享，则必须考虑到符号公共性问题，因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调适与对话就成为公共修辞的关键^[42]。比如美国“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如果石油泄露入海的录像从未公布，它便只能停留在个体经验层面，无法被公众所感知；而“大海”也因其污染覆盖面而具有世界性公共潜力。

其次，环境治理需要在逻辑层面解决符号表征的真实性问题。符号是可以说谎的，也常具有一种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ce），存在一种意义内部循环而远离指涉对象的倾向。如果网上信访治理只是给予信访人以符号意义上的满足，以象征性的及时办理和快速回复掩盖实际问题，便不能真正响应信访人提出的问题，而且冷冰冰的符号化回应也难以真正安抚其中的社会情绪^[43]。图像符号与对象存在深度的物质、时空及形象上的逻辑关联，具有一定的证据效力，同时也具有深刻的视觉语法或视觉话语^[44]，当它将有冲击力的环境污染画面呈现出来，便能激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为环境治理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语言意象也具有动人社会动员力量，比如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将环境问题提升为人类重要命题，某种程度上即仰赖于描述了鸟儿不再歌唱、鱼儿不再跳跃、生命不再繁衍等文化意象，从而

将杀虫剂（DDT）的潜在危害形象地表达出来。

再次，环境治理需要解决符号表征的制度性问题。符号表征不能仅停留在个案上，还需要建构一套制度性规范，以使个案符号获得系统性文化后果及制度性治理效能。话语制度主义认为，一种话语要在竞争中获得霸权地位：首先，概念必须被大多数人接受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实现“话语结构化”；其次，话语必须被转化为公共政策、制度安排和组织实践，实现“话语制度化”^[45]。比如PM2.5作为一种标准化符号，在中国就经历了结构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已经开始了PM2.5的测定与研究，但直到2011年，公众才所广泛知晓这一概念，起因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则涉及PM2.5监测数据的天气预报微博。此事引起了网络舆论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卫生专家、气象专家也参与其中，纷纷主张将PM2.5纳入监测指标体系。虽然北京环保局将其斥为“不科学”，另一些官方话语也以“技术不成熟”“影响招商引资”等为由加以拒绝^[46]，但是公众逐渐取得共识。最终在国家转变发展理念的“元话语”支撑下，PM2.5概念被写入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成为环境治理的一种制度性话语，使得“原本极度抽象的污染问题瞬间变成了普通公众都可以轻易把握的数字游戏”^[47]。

（二）修辞论辩路径：议题协商与合法性

环境治理最显著的障碍是立场差异所导致的议题冲突，它涉及管理、利益、发展、阶级、种族、性别等话语所导致的冲突。环境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征用符号资本以建构合法性的过程，而“符号资本是成功地通过利用其他资本而获得的”，任何资本一旦被广泛地看到和承认，就会变得具有象征意义，其他资本只有获得符号的承认才能获得特定的象征效力^[48]。因而，修辞论辩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使得符号被承认以形成象征资本，并征用已有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实现合法性的建构。

首先，国家是“象征资本的中央银行”^[49]，它可以在环境治理中运用其制度性资源，将优势的修辞话语上升为制度性话语，实现与社会的协商

或对话。如上所述，环境治理很大程度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也是一个修辞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上述关于PM2.5的修辞争论中，起初的官方话语及其所征用的科学话语，就面临着公众的直观感知（雾霾）、美国的监测标准、其他专家的科学话语以及国家生态文明元话语等话语形态的压迫力。可见，在公共场域中，官方话语也不必非定于一尊，而是需要不断地经受公共性论辩的检验，进行必要的更正、补救或者放弃，以获得更多舆论的支持。国家始终在不断靠近公共性话语，并最终在程序和制度上形成基于国家象征资本的规范性话语。

其次，反话语通过否定性的元符号推进环境元治理的辩证展开。如上所述，环境治理总面临着失败的问题，因而需要通过元符号加以解释、论辩和推进，以实现更加深层的环境元治理。反话语（anti-discourse）作为对主流话语的反对、反抗或反叛，是修辞辩证法的另外一端，它始终在打破（否定）环境治理的现状，以进一步触及环境治理的更深层问题。反话语通过不断地发明意指概念、建构凝缩图像、展开话语勾连等方式，即将隐藏的环境问题变得可见或可说，将其形塑成某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符号意象。反话语还通过各种静坐、游行、示威、串联，甚至暴力破坏、行为艺术等方式，展现一种现实的抗争力量，并通过社会运动形成独特的替代性公共领域，与主流话语公共领域相抗衡，使环境治理通过元符号运作得以辩证地推进。

再次，环境治理需要对多元主体的修辞意图进行整合，以寻找最大公约数而达成共识。哈贝马斯意识到，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都是一种独白性的“理性”，都有一种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的倾向，因而他主张通过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以达到彼此的理解而实现认同。理解的达成必须以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言语有效性条件为基础，因为“一个交往行为要达到不受干扰地继续，只有在参与者全都假定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已得到验证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90]。环境治理中的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yard, NIMBY）问题实际上是基于

日常生活的直接感知而产生的，因而其治理效能的实现不能仅采取远离日常生活的宏大论证，不能只停留在公共修辞的层面，而是必须考虑到各种利益、情感、价值、规范等具体差异，采用综合性的修辞方式，才能在具体而微的交往理性中实现环境治理。

（三）话语建构路径：权力的自然化策略

话语作为一种合法性建构的策略，它往往能够将权力、资本、文化等加以自然化，使大众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接受权力所施加的观念影响。话语常常与知识、真理、监视、检查等结合在一起对现实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话语即是一种实践或者事件；权力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弥散在社会的毛细血管中，它不仅只是一种消极的否定性，而且还具有积极的社会建构功能，其核心机制即为话语实践。环境治理总是面临各种权力的博弈，工业主义话语、绿色话语、阶级话语、性别话语等所体现的权力趋向千差万别，而环境治理则需要在这诸多话语形态中处理权力冲突的问题，以使某种主流话语获得一种自然化的存在状态，或者使另一种自然化的存在状态被揭示，以推进环境秩序的重构。

首先，环境治理的根本在于善治理念的重塑。这就需要在符号维度获得对于某种环保理念的理想认知，并且利用某些文化的模型、观念及话语加以建构，以让环境治理理念获得相应的思想传统。其理念就包括：处理环境与社会和谐发展，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处理人与人和谐共处。可持续运动即是在社会发展的维度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将看问题的时间视角拉长，以克服社会发展的短视问题。这与中国文化反对竭泽而渔的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一种兼顾了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理念。而荒野保护运动则将自然视为一种审美的对象，认为自然具有景观、学习和休闲的价值；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则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获得“天-地-人”三才的共生视野。环境正义运动则依托在种族话语、阶级话语以及民族国家话语之上，试图处理的是在环境治理中的种族、阶级和国家之间的正义问题，是在社会维度上进行的环境符号化治理。



其次，环境治理还需要对某些陈旧理念进行批判，以揭示权力的隐秘逻辑。旧的环境观念并不会自动退场，它总是依附在一系列话语实践当中，成为人们习焉不察的隐秘存在物。经济逻辑是主宰现代社会的核心认知模式，它已经作为一种隐喻弥散到了一切认知当中，成为人们进行环境治理的潜在思维方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对工业主义话语的有力纠偏，它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成为重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话语引擎，也是对于生态原教旨主义的一种隐喻式反驳，其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如果只将环境治理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来理解，看不到自然与人类的生命、审美、文化、健康等维度的关系，“两山理论”的“经济逻辑”便会导致其走向反面。环境治理中的权力问题常常隐藏在符号的深处，只有通过批判才能将其揭示。

再次，符号批判不能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还必须进入到实践场域之中。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5]，社会的进步既需要批判的理论，也需要将理论转化为人的思想并作用于实践。环境的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等运动，都在试图通过理论批判及现实抗争的方式，以促进认知并施加压力，从而推进问题的解决。它还需要通过行政化、市场化以及法制化的方式形成相应的体制机制，使环境治理的各种复杂关系或者问题获得一种体制性的解决。体制性方案只有依赖于概念、隐喻、话语等符号的支撑，才能被社会所理解、认知、交流、实施及推进，并获得国家机器的保障。

四、结论与讨论：环境治理的符号化方法论

环境治理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其核心是人的观念，环境治理即是经由观念而治理。人与自然处于何种关系，在不同的思想流派中是千差万别的：自然可以作为征服的对象，可以作为恐惧的荒野，可以作为生存的背景，也可以作为共生的存在。如果将自然转化为句子成分，则可将自然“对象”视为“宾语”，“荒野”视为“未知”，“背景”视为状语，而“共生”视为共在的“主语”。在此，人与自然

的关系，就可以被捕捉为句子的语法关系，而通过语法分析即能获知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模型。

符号背后总有主体动机的存在，它也是实现某种意图的修辞工具。最好的修辞是自然化的，是不留痕迹地通过隐喻的方式在无意识中建构的，修辞治理的任务之一即是对修辞隐喻机制的揭示。如此，修辞即得以洞察既有环境观念的秘密，获得改造顽固观念的认识路径。对于修辞动机的掌握，也有助于把握环境问题的意义脉络，获得有的放矢、富有针对性的治理路径。另外，不同修辞动机之间还存在一系列冲突或博弈关系，在舆论中征用不同的力量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主体也可通过修辞性的对话以形成共识，获得一种公共性的视野，将其转化为制度性安排，最终将修辞实践转化为治理效能。

环境话语不是一种纯形式层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环境实践，它通过话语分配、博弈及交换，社会实践得以有序进行。话语的维系又依赖于一整套知识体系、管理体系及法律体系，它也需要在复杂的话语市场中，克服陈旧观念体系或知识体系，以获得善治的话语体系。只有话语被运用到实践当中，转化为革命性、制度性的力量，符号才能获得治理环境的物质性力量。因而，环境符号化治理的问题不仅只是表征问题和修辞问题，而且也是一种话语实践问题，它需要获得制度性的物质力量才能实现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 [1] 唐代兴. 国家环境治理学的中国话语构建 [J]. 河北学刊, 2018, 38(05): 10-16.
- [2] 卡莱维·库尔, 瑞因·马格纳斯. 生命符号学: 塔尔图的进路 [M]. 彭佳, 汤黎, 等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132.
- [3] Davidson, D. J., & Frickel, S.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Critical Review [J].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004, 17(4): 471-492.
- [4] Lemos, M. C., & Agrawal, A.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J].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06, 31(1): 297-325.
- [5] 朱留财. 从西方环境治理范式透视科学发展观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05): 52-57.
- [6] Jessop, B. Governance and Meta-governance. On Reflexivity, Requisite Variety, and Requisite Irony [M] // in H. P. Bang, ed., *Governance a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1-

116.

[7] Jessop, B.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Governance and Post-Fordism: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J]. *Economy and Society*, 1995,24(3):307-333.

[8] [24] [32] 罗伯特·考克斯. 假如自然不沉默: 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3版)[M]. 纪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28;347;23.

[9] Miller, P. and Rose, N. *Governing the Present: Administer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ersonal Life* [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8.

[10] Kooiman, J. *Governing as Governance* [M]. London: Sage, 2003:7.

[11] Jessop, B. Spatial Fixes, Temporal Fixes, and Spatio-Temporal Fixes. [M]// *In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N Castree, and D. Gregory. Oxford: Blackwell, 2006:142-166.

[12] Gjaltema, J., Biesbroek, R., & Termeer, K.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to Meta-governanc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22,22(12):1760-1780.

[13] 汉斯·兰克. 人是元符号和元解释的存在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9(05):47-50.

[14] Lotman, Y. M. The Semio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oncept of a Text [J]. *Soviet Psychology*, 1988, 26(3):52-58.

[15] Grek, S. Prophets, Saviours and Saints: Symbolic Governance and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Metrological field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2020,66(2):139-166.

[16] Swartz, D. *Symbolic Power, Politics and Intellectuals: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111.

[17] Korkut U, Mahendran K, Bucken-Knapp G, et al. Introduction: Discursive Governance: Operational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M]// *Discursive Governance in Politics, Poli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11.

[18] Lazar, M. M. Semiosis, Social Change and Governance: A Critical Semiotic Analysis of a National Campaign [J]. *Social Semiotics*, 2003,13(2): 201-221.

[19] 刘琳琳, 黄河.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环境治理话语的演变与发展 [J]. 国际新闻界, 2022,44(02):58-77.

[20] 李娜, 王梦. 策略改造与隐性规训: 环境话语研究的学术版图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9,72(04):91-103.

[21] 郭小平, 李晓. 环境传播视域下绿色广告与“漂绿”修辞及其意识形态批评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47(01):149-156.

[22] 谭爽, 任彤. “绿色话语”生产与“绿色公共领域”建构: 另类媒体的环境传播实践——基于“垃圾议题”微信公众号 L 的个案研究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04):78-91.

[23] Hajer, M. A.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280-286.

[25] 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M].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15.

[26] Edelman, M. J.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M].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6.

[27] 乔治·莱考夫. 别想那只大象 [M]. 阎佳,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

[28] 刘景芳, 周佩, 高也. 转基因话语的构建、异化、与重塑——以百名诺奖获得者与绿色和平组织围绕“黄金大米”的争议为例 [J]. 新闻大学, 2018,150(04):57-62+97+152.

[29] 李玉洁. 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建构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49(04):136-140.

[30] Burke, K. *Permanence and Change* [M]. Los Altos, CA: Hermes Publications, 1954:29-30.

[31] Burke, K. *A Grammar of Motives*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5:15.

[33]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 [M]. 张文杰,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1-13.

[34] Pezzullo, R. D. S. P. C.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nvironmentalism: The Social Justice Challenge to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4.

[35] 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 [M]. 李幼蒸,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56.

[36] 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 [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88.

[37] 刘景芳. 中国绿色话语特色探究——以环境 NGO 为例 [J]. 新闻大学, 2016,139(05):8-16+7+145.

[38]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29.

[39] 王林亚. “债务换取自然”与塑造绿色话语霸权: 美国对热带森林的保护政策及评析 [J].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21,867(07):13-24.

[40]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M]. 陈嘉映, 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1:135.

[41] DeLuca, K. M., & Demo, A. T. Imaging Nature: Watkins, Yosemite, and the Birth of Environmentalism [J].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000,17(3):241-260.

[42] 刘涛. 公共修辞: 话语实践中的公共利益及其修辞建构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9(06):67-82.

[43] 杨杨. 网上信访治理的符号化: 缘起、风险与应对策略 [J]. 理论导刊, 2022,448(03):84-89.

[44] 刘涛. 图像研究的语义系统及其视觉修辞分析方法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8(04):37-48.

[45] Hajer, M. A. Coalitions, Practices, and Meaning i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From Acid Rain to BSE. In *Discourse Theory in European Politics (297-315)*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303.

[46] 张海柱. 环境政策论争的话语分析——以 PM2.5 争议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为例 [J]. 太平洋学报, 2012,20(06):62-70.

[47] 刘涛. PM2.5、知识生产与意指概念的阶层性批判: 通往观念史研究的一种修辞学方法路径 [J]. 国际新闻界, 2017,39(06):63-86.

[48] 戴维·斯沃茨. 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M]. 陶东风,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2:107.

[49] Bourdieu, P. *Pascalian Meditations*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240.

(下转第 51 页)

Inventing "Pollution": The Genera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iscourse Ideas History

Zhu Yajing

Abstract: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reconstructing the values and identity system of modern socie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the core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logic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ety development" to review the ide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ch is the key concept and also the origin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With the text analysi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the appearan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actually accompanied by the overall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ocial concepts. The argument claims of whether "pollution" is a technological "waste" or a "defect" of social structure, us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al emotion resources to generate a discourse network connecting political discourse, scientific discourse, cultural discourse, ethical discourse etc. This "concept - social order" discourse op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China's local practice has invented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which led by government and participated by multiple social communitie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issues; argument claim; technical rationality;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Author: Zhu Yaj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上接第 41 页)

[50]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M]. 张博树,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1989:3.

[51] 卡尔·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 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9.

Semiotizing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Topics: Theories and Pathways

Li Hong

Abstract: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not only about nature, but also about ideas and society. Signs can represent nature, spread ideas, and resolve conflicts. Representation can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identification, semiotic Rhetoric can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controversy, and discourse can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power. Accordingly, the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topics is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ublicness through proper name to br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into the public's view;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negotiation and legitimacy through rhetorical controversy; and to transform power into knowledge through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o realizing the naturalization effect.

Keywords: environmental topics; meta- governance; meta- sign; semiotizing governance

Author: Li H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